

【新加坡】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

日本外交



「偽裝難民」問題與
日本的傳播媒介

卓南生

反对党为何为小泉抬轿？
——三谈“有事法制”

了解了上世纪90年代
日本政坛的上述基本特征，
再回头看看今日朝野两大
党的现状与国士第一讲话

卓南生

副教授。

1991年，出任该党委员
长的田边诚就提出自由改革

白宫为何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从“中国崛起论”到“中国分裂论”



世界心誠

出版社

日本外交

「新加坡」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



世界
出版
社

出版说明

《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是新加坡著名报人学者卓南生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关注、研究日本长达 40 年的文章集成。本书共分三卷，即《日本社会》卷、《日本政治》卷和《日本外交》卷。

《日本社会》卷涵盖了作者这一时期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感受与思考，主要反映了日本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以及发展态势。作者对日本保守势力的走向及其对“战前”之“乡愁”给与了特别的关注，而且持续不断地追踪并给予剖析。

《日本政治》卷汇集了作者对这一时期日本政坛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评论，以及对从佐藤荣作到小泉纯一郎的历届日本政府的述评，文章系统而清晰地反映了日本政坛从“保革对峙”到“总保守化”及各政治派系演变的过程。

《日本外交》卷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观察，其中，对日本亚太外交，特别是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及日本对中国、韩国外交的观察和分析尤为深刻。

卓南生先生既有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力，又有学者的理性分析，且几十年来聚精会神地关注和研究当代日本问题，他对日本社会了解之深、对日本政坛分析之透、对日本外交观察之细都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作者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出发，报道日本、研究日本，文中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这套文集的出版，相信会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的新视角。

肖向前序

世界知识出版社要出版新加坡著名学者卓南生先生的《日本时论文集》，承蒙卓先生厚爱，嘱我作序，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答应了之后却又感到难度不小；但是，既然已经承诺，只能勉力为之。倘有可取，则幸甚至哉！

我和卓先生一样，都是亚洲人，又都是华人；我们血统相同，语言相通，文化相源，而且又都先后在亚洲最先发达的国家日本留学。1938年我到日本学习的时候，正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期。卓先生留学东瀛则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之后，日本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巧用时机，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尽管我们相差了20多岁，对日本观察、研究的起始年代各不相同，彼此相识也较晚，但在观察日本，尤其是结合亚洲发展的前途，关心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等诸多方面，我们都报以极大的关注，并拥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观点。

无论是从土地、人口和资源来看，亚洲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亚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启蒙与发源之地。直到200年以前，世界其他各洲依然无法与亚洲相比；但是，近200年来随着产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和资源，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演变。从18世纪开始，经过19世纪的鸦片战争等重大侵略战争，一直到对世界实行瓜分与再瓜分的两次世界大战，亚洲成为落后挨打、备受侵略凌辱的集中地区。但亚洲人民并未屈服，在这一二百年落后挨打的时期奋起反抗，争取独立自主，不怕牺牲，团结奋斗，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人民的

胜利。此时亚洲多数前殖民地国家逐一走向独立，开创了亚洲崭新的历史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既有效地打击了狂妄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又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打败了不积极抗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告诉世界，人民逐渐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形势向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战以后世界有很大发展，智者、贤人都从发展的形势看出，21世纪是亚洲崛起的世纪。欧洲、美国的有识之士对此看得更为清楚。他们能从19世纪的欧洲起家到20世纪的美国称霸，预感到21世纪亚洲崛起是无可争议的。面对亚洲的正在崛起，亚洲人不能不由衷地高兴。我这个年近九十的老人，也正为此而欢度余生。

亚洲的崛起是地球上的大事，东亚各国的团结对促进亚洲的整体联合更是极有必要的。东盟提出“10+3”，即东盟与中、日、韩的联合，可望成为亚洲各国团结的重要推动力量。中、日、韩是当前较为有实力的国家，其中日本更是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人们自然会对它另眼看待，希望它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但是，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回应亚洲的态度，既有恶劣的前科，又有否定历史的如下趋势。

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以侵略亚洲近邻朝鲜、中国为原始积累，打就了其产业现代化的基础，其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他以高唱“脱亚”闻名，突出地蔑视朝鲜、中国，鼓吹日本要与西方侵略者为伍，更用神化日本天皇，指挥日本人要舍身为天皇卖命、为日本军国主义打前锋、做炮灰。

二、现在又有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当政者和国会议员，不承认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对近邻亚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伤害，甚至有人竟无耻地说那是日本从欧、美把亚洲解放出来的作为，硬是不为自己的侵略认罪。

三、伪造历史，编写各种错误百出的教科书，不向日本年轻人说明真实的侵略史实，使日本青年误入歧途，妄图以所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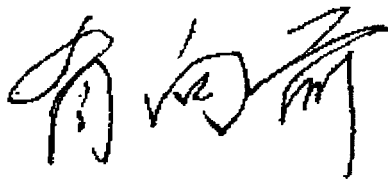
国”东山再起。

更有甚者，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五度参拜供奉着 14 名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中国、韩国和其他遭受侵略的邻国的强烈抗议，然而小泉并未改变其错误言行，导致日本同中、韩关系的严重恶化，小泉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

除此之外，东京还错误地估计世界大势，妄图巴结美国霸权主义，以“事大主义”（趋炎附势）心态，追随美国以图在亚洲实现其盟主梦、大国梦。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这本应该是日本学习德国，诚恳地承认罪行，取得亚洲邻国信任的良机，但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小泉首相居然扬言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宣称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意图尾随美国干涉台海事务。这不能不说是小泉及日本右翼势力在政治上的严重错判与失策。且看今日之小泉如何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日本二战后的右倾化问题，卓南生先生早在 10 年前，就在其著作《大国梦与盟主论——“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 年）中，从各个层面予以评析。本次出版的时事论文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与《日本社会》，收录了卓先生近四十年大量的时事评论，进一步详尽地剖析了二战至今日本在政治、外交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发展形势，我诚恳地向中国读者推荐。



2005 年 12 月

自序

集 40 年对日本观察的时论《文集》就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为作者，我既有禁不住的喜悦之情，又有不安之感。喜悦的是，这 180 万字的时论毕竟是自己不同岁月，对日本的时政、外交与社会动向不同之感触、观察与不断思索和耕耘的心血与结晶；今天能与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交流，对我个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乐事。不安的是，这横跨近 40 年的《文集》，既涵盖了笔者二十来岁时的习作，也收录了不少与截稿时间竞赛之急就章。加之笔者个人在不同年代对日本的观察与体会，其中也不乏肤浅与独断之处。如此不成熟之时论，是否适合在国情不同的中国读者之间广泛流传，笔者在付梓之际难免有所迟疑。

几经犹豫，笔者鼓足勇气，决定不对旧稿作进一步的压缩和筛选。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除了与个人敝帚自珍的心态有关之外，另一个促使笔者勇于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习作也收录于此文集的原因，是这些拙稿的撰写年代恰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所重叠。那时的中国正在忙于内部的“批、斗、改”，对于外界（包括日本）的动向与信息，相对而言，似乎关心不很充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笔者，尽管对日本的观察并不深刻，文字也显稚嫩，但有关的报道与评述还勉强称得上是“贴近日本”，至少情感是纯朴的（其中当然也不乏血气方刚青年有偏激之嫌的言论）。如果这些纯朴的评述，多少还能给读者留下时代的鸿爪，多少还能粗枝大叶地显现出一个热带的青年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土壤与大气候的感受，或者填补一些时代信息的空白，或引发读者对那段时日的日本的话，我想，这些习作的旧稿也就完成了其使命。

笔者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踏上留日的道路的。当时在新加坡，留日是少数派，今日仍然是少数派。

远在赤道小岛的青年，为何要做出这项看不出有何“投资”意义的“留日”的选择呢？不少初次见面的日本朋友都表示难以理喻。在抵日之后，至少有两位日本师长善意地劝告我快快离开日本，另寻深造之处。推究其因，一来是战败后的日本百业待兴、社会矛盾重重，日本人还未恢复其信心（有时遇到陷入“日本人原罪论”苦恼的日本朋友，我们还得多番安慰，并鼓励他们：错的不是日本民族本身，而是误国殃民的“国策”。）；二来是日本教育制度的腐朽与僵化（它是引发当时学运爆发的一大根源），加之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强，关心留学生的日本师长认为日本还未具备接受留学生的主、客观条件，亚洲青年没有必要留在此地耽误宝贵的青春。

至于留日之前，备受师长、亲友的反对和劝阻，更似乎是我们同年代不少留日同学的共同经历。“到那残暴的国家究竟能学些什么？”不少亲友都直截了当，提出了这么一个单纯但又尖刻的问题。

几经思索，笔者还是毅然走上了不被看好的留日路程。之所以这么决定，可归因于下列的几个“固执”：

一、“固执”地相信接受惨痛败战教训的日本在战后会以崭新的、和平的面貌出现；战后的日本已经与战前思潮诀别。

二、“固执”地想贯彻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的信念和心愿。

三、“固执”地认为在新闻出版事业发达的日本学习新闻学，有助于自己自幼就想从事的新闻事业。

尽管如此，离新（新加坡）前夕亲朋好友对日本提出的看法与质疑，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战后的日本究竟与战前有何不同？”、“日本究竟在哪一方面变，哪一方面不变？”等问题，遂成为了我踏上旅日路程后不能不反复思考的研究课题与“问题意识”，也成为了我向新加坡读者汇报日本国内最新动向，分析时局变化的“原点”。但没想到这“阴差阳错”的留日决定，以及由此而开始撰写的“旅日通讯”，却促使我与日本时评结下了

不解之缘（详见本文集《日本社会》篇中的《我怎样与日本时评结下不解之缘》）。更万万没想到40年前新加坡乡亲们提出的纯朴的一些问题，却成为了我迄今仍无法做完的习题。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这些习题的总汇；耐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心主线始终未离开日本的“变”与“不变”。

1989年，笔者从报界转入学界，照理是可以乘机摆脱这没完没了作业的最好借口和机会。无奈旧病复发（“职业病”乎？），无法安分守己。眼看着那高潮起伏的日本政治连续剧与虚虚实实的外交游戏，及日本传媒擅长的舆论诱导与造势，笔者虽不在现场第一线，但是仍难以抗拒发抒己见的诱惑力，而每每有奔赴现场，追踪大事件及其演变，进而剖析其缘由的冲动。加之大学授课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新闻学与国际关系，有关日本大众传媒及其论调之走向、日本与亚太的关系依然是我关注之重心所在。十余年来这些方面的时评着墨较多，显然是与我上述教学与研究的方向有关。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于日本之观察与认识（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话），得益于留日期间的“大动荡年代”良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正如前文所述，是日本百业待兴、社会矛盾重重，日本走向尚未明朗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是日本新旧两代（准确的说是新旧两股思潮）在针对日本何去何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不管是在校园内，还是大街头，随时都可以看到慷慨激昂的日本人，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达其政治主张及对现状改革的看法。那是一个不少老年人痛心疾首，向年轻人叙述劫后余生的经历，而年轻人则以谈哲学为荣，无时无刻不爱争论的年代。听听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的心声，仔细阅读各家各派撰写的政论文章或他们分发的传单，进而解读其标语、口号所含的意义，这对于一个想了解日本的“变”与“不变”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应该这么说，今日日本国内备受争议的诸多政策与话题，早在当年已被争论得热火朝天。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留日生活对笔者往后的“日本论”影响良深。当年的留日，看来并非虚度年华。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正是在那个大鸣大放与“国论二分”（指对国家走向两种不同看法和声音）的年代里，笔者有幸得到不少日本良师益友的指点迷津。他们或者耐心地向笔者清晰地剖析日本战前的政治经济界和文化界与战后藕断丝连、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现身说法，让笔者知道战前的日本怎样对内进行“总动员”，如何对外使用其“文化”的“软力量”……

至于战后的日本大众传媒，虽然基本上从未离开过“国益至上”的基调，但在那个大气候中，有时也会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角度的信息与分析文章。（这当然得归功于战后不少优秀而有良知的报人与文化人的共同努力。）它与今日“总保守化”论坛近乎一边倒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笔者在长期撰写时评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从中吸取了不少水分与阳光，并认真学习他们透过新闻现象看问题本质的本领。借《文集》出版的时机，我谨此向这些日本人士致以敬意与谢意。

笔者的日本时评，始自留日第二年的1967年（之前多为译稿之习作）。在1983年3月新加坡《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之前，拙稿主要发表在《星洲日报》，也有一小部分刊于《南洋商报》；在这之后，则主要刊于《联合早报》。另外，也有不少文章曾同时或分别刊于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香港的《信报》、《明报》、《大公报》、《亚洲周刊》，台北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中时晚报》、《日本文摘》，北京的《人民网》日本版、《世界知识》及《中国青年报》等。为了统一格式，每篇文章之末皆注明发表日期（1992年以前只写年月，之后则写上年月日）。《日本外交》篇附录的《座谈·访谈·对谈》则皆注明文章发表的报刊和年月日，笔者在此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座谈会策划者与出席者，访谈者、受访者、对谈者及协助记录与整理者。笔者也借此机会向所有曾提供宝贵版位的报刊与同人致以谢意。特别是笔者曾服务长达16年的前新加坡《星洲日报》与《联合早报》的前同僚和新朋友，因为直到今天，大家仍然把我当为华文报大家庭的成员。在任何时候，报馆和同人们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而我每

次回返新加坡，也必到《早报》，因为对我而言，就宛如回到老巢而有温暖之感。

在《文集》出版的过程中，曾给予协助或提供各种宝贵意见的朋友不计其数，这里不一一列出。但有几位得特别致以谢意，他们是协助校稿的厦门大学年轻教师毛章清先生和北京大学研究生李杰琼同学；还有，及时帮我查询相关资料的《联合早报》东京通讯员符祝慧小姐和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扬同学。

笔者得同时感谢近40年来与我四处漂泊的内人蔡史君。为了撰写时评，笔者养成了不轻易扔一份旧报纸、一本旧杂志的坏习惯，书房凌乱、报刊铺桌盖地、人与书报在大厅抢空间，已成为我家常年的写照。何况在忍受如此狭小空间之余，忙于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她还常得成为拙稿的第一个读者，并提出坦率的意见。

此外，应该感谢劳苦功高的《文集》责任编辑罗养毅先生，及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予以关怀和鼓励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世界知识》主编姚东桥女士。

至于高龄近九旬、在中国对日外交特别是中日恢复邦交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中日友好运动不遗余力、迄今仍然密切关注日本与亚洲走向的留日老前辈肖向前大使，亲笔为本《文集》撰写序文，更为本《文集》增辉不少，我谨在此向肖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最后，我得感谢李氏基金的支持。本《文集》是在新加坡华中校友会前后期会长吴定基与黄世荣同学的推荐下，获得李氏基金的资助出版的。仅此向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致以万分的谢意，也向吴、黄等华中老同学们说声谢谢。

卓南生

2006年1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肖向前序 /3

自序 /7

1968—1979

美机在日本一再闯祸引起的风波 /3

美国资本要闯开日本门户 /7

冲绳美军基地与毒瓦斯 /11

日本新旧两代的鸿沟 /14

日本的传统外交及其今后政策 /17

美日“归还”冲绳协定 /21

佐藤“大国外交”触礁 /24

奉行“追随外交”者的悲剧 /27

从日本南进论系谱看“海洋东南亚论” /31

在日本看联合国表决中国席位 /38

日本倡议修建新马泰高速铁路 /42

评日本“亚洲通”的东南亚观 /45

泰国学生抵制日货运动来龙去脉 /52

- 日本舆论怎样看泰国抵制日货? /58
 日本为何急于推行文化外交? /61
 苏联向日本推销亚洲安保体系 /65
 田中访苏与西伯利亚资源开发问题 /69
 从“金大中事件”看日韩关系 /73
 从田中将访问东南亚谈起 /77
 “资源小国”的阿拉伯政策 /81
 田中南访前夕谈日本的东南亚观 /84
 田中南访之后再谈日本的东南亚观 /88
 同床异梦的西伯利亚联合开发计划 /92
 美舰进入日本港口是否携有核武器? /98
 马六甲海峡与“祥和丸”事件 /103
 东京经济峰会与东盟 /107
 “经济动物”本色不变? /109
 飘摇不定的日本外交 /111
 日本应停止经援越南 /113

1980—1989

- 日本与东盟 /117
 日本和环太平洋共同体 /119
 从铃木将访东盟谈起 /121
 美日“同盟”所争何事? /123
 “日本式”的外交 /125
 从美日贸易摩擦谈起 /127
 日本与西方工业国的摩擦 /129
 在北海道看日苏领土纷争 /131
 “福田主义”五周年 /157
 日韩关系透视 /159
 “礼仪外交”行得通吗? /161

- 中曾根南访是否成功? /163
 评日本的“第二次开国” /165
 从全斗焕总统访日看日韩关系 /167
 越南外长阮基石东京之行透视 /170
 日本“双簧外交”的剖析 /174
 日元增值后美日之间的争执 /177
 从美日关系演变看日本的内政与外交 /180
 苏联对亚洲的新姿态与苏日关系 /188
 日本首相中曾根汉城之行 /193
 美日贸易战白热化 /195
 中曾根访美空手而归 /198
 日本何以急于经援越南? /201
 邓小平谈话与日本的反应 /204
 竹下登如何实践“诚实外交”? /207
 竹下访美是否成功? /209
 四小龙处境与日本态度 /212
 美日牛肉柑橘谈判破裂 /215
 中曾根莫斯科之行的剖析 /217
 日苏外长互摸“领土”“经济”底牌 /220
 日本将如何展开“新皇室外交” /223
 日本式外交与国际社会常理 /225

1990—1999

- “遗憾”乎?“道歉”乎?
 ——日韩两国所争何事 /231
 从“遗憾”到“痛惜”
 ——日韩的历史难题 /235
 卢泰愚访日后的“日韩伙伴关系” /238
 卢泰愚访日后看日韩历史恩怨难题 /241

- 苏韩建交声中平壤打出“日本牌” /244
- 戈尔巴乔夫带给日本什么礼物? /247
- 扫雷艇出航与海部南访 /250
- 海部南访有些什么成果? /253
- 在日本看日相海部的“反省” /256
- 海部“反省”后的反应 /259
- 评海部俊树的北京之行 /261
- 日本“新天皇外交”面临考验 /264
- 东京北京互亮底牌 /267
- 日皇北京之行及其“谈话”的剖析 /271
- “汪辜会谈”与日本媒体的“惊”、“警”与“忧” /276
- 西雅图亚太会议与日本的“盟主论” /280
- 东京对核武器情有独钟? /284
- 村山南访与日本传媒反应 /287
- 日本传媒对“常任理事国”望眼欲穿 /289
- 亚欧会议与日本传媒反应 /292
- 台海危机与日本微妙态度 /295
- 台海平静后看日本舆论导向 /299
- 钓鱼岛领土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 /302
- “福田主义”是否已过时? /307
- “桥本主义”呼之欲出! /309
- 日本传媒与香港回归 /312
- 中日关系的死结在哪儿? /314
- 文字游戏与中日摩擦火花 /317
- 中美日俄外交新游戏 /320
- 印尼动乱与日本的反应 /327
- 克林顿访华与日本的焦与慌 /332
- 村山向纪念碑献花后的政治效应 /336
- 金大中总统访日后看“日韩新时代” /338
- 江泽民访日前夕看中日“历史问题”的争议 /347

- 江泽民访日前夕看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反应 /350
 在东京看中日关系如何闹僵 /353
 透视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 /357
 日本传媒如何解读北京的“历史情结” /361
 中日关系应如何改善? /365
 从“中国崛起论”到“中国分裂论” /369
 日本投“石”问路大打“台湾牌” /378

2000—2005

- 朱镕基访日与日本大打“经济援助牌” /383
 从“出钱不开口”到开口讨功劳 /385
 东京渲染北京的灵活姿态 /387
 东京的“感谢外交”论与“微笑外交”论 /390
 北京何以处在招架地位? /393
 增信释疑有待双方努力 /396
 中日关系与日本专家的历史观 /399
 中日关系与日本专家的中国论 /402
 北京对日外交须有新突破 /405
 日本缘何急于搞“文化交流” /407
 小泉南访推销“中国威胁论” /410
 小泉南访后看日本舆论导向 /412
 日本媒体如何评价小泉南访 /415
 日本媒体怎样炒作沈阳闯馆事件 /417
 沈阳闯馆事件结束后看日本的舆论导向 /419
 小泉访朝与日本的亚太战略 /422
 日本媒体与朝鲜“绑架事件” /426
 东京期待中韩什么新姿态? /429
 试探中韩新领袖对日政策底线 /432
 日韩关系能好转吗? /435

- 卢武铉先柔后刚说明了什么? /438
小泉访朝与日本外交战略 /441
参议院选举前夕小泉再打“朝鲜牌” /444
出钱第二多是最大理由 /447
“国际贡献”有多大说服力? /449
“大势所趋”造势受挫 /452
最大阻力来自美国 /455
退而追逐“准常任”? /457
从假模糊到真清晰 /460
东京怎样看待“反分裂国家法” /463
日本“争常”造势虚虚实实 /466
“美国支持”原来是个梦 /469
小泉“道歉”谈话的分量与意义 /472
东京缘何不畏孤立 /475
借“争常”造势行“修宪”之实 /477

座谈·访谈·对谈 (1972—2005)

- 从东南亚看中日恢复邦交 /483
新加坡前留日学生谈日本 /492
从柬埔寨问题谈到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与《朝日新闻》林理介对话 /508
新日关系·日本热·教科书问题
——与日本驻新大使中岛敏次郎一席谈 /515
从中曾根南访谈到军备问题与外交
——与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藤波孝生一席谈 /519
日相南访前夕畅论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524
田中判罪后的日本政局 /536
令人忧虑的“日本战后政治总决算” /542
从东南亚看日中关系